

明代「湟中三捷」考评

赵宗福

明朝万历二十三年（公元1595）的“湟中三捷”是明代边疆战斗史上重要的战事，但是《明史》、《甘肃通志》、《西宁府新志》等史书多有漏载和误记，一些地方史著作也多避而不谈，或者只记南川、西川两战。本文拟对“湟中三捷”的始末作一粗浅考评。

一

青海湖地区古来水草丰美，宜于游牧，自唐以来藏族部落就生活在这里，

“专务畜牧，日益繁兹，素号乐土。”到了明代正德时，东蒙古亦卜剌、阿尔秃厮等部“袭而居之”^①后，便出现了所谓“海寇之患”。嘉靖、万历年间，西海蒙古土默特诸部势力更大，经常抢掠藏族部落，攻袭西宁卫等地，与松山、甘山蒙古串通一气，为患西陲，河湟地区岁无宁日。

青海藏族部落被迫向蒙古贵族贡物效力，“不堪剽夺，私馈皮币曰手信，岁时加馈曰添巴。”^②“年复一年，剥削日甚，以麦豆青稞，口食取之番也；褐疋毛布，轻暖取之番也；迫其抢掠，或令为向导，或驱为前锋，兵力亦取之番也。”^③当时藏族部落虽有数万之众，但只有忍辱为奴，或者远徙他方。

明朝军队难以对付蒙古贵族的攻袭，甚至全军覆没，折兵损将，如万历十六年（1588）九月，永邵卜部入掠西宁南川，副总兵李魁被歼于王狗儿峡，官兵死伤850余人，官马被夺700余匹；十八年（1590）六月，火落赤等部入掠洮州，副总兵李联芳阵亡，明军三千人覆没；七月，又深入河州等地抢掠，游击李芳阵亡。明廷派兵部尚书郑洛经略青海。郑洛采取招抚藏族，分化孤立

蒙古，焚毁老巢之策，十九年（1591），肃清西宁卫诸地，焚烧仰华寺。永邵卜等蒙古徙账而去，藏民“复业者至八万余人，西陲暂获休息。”^④但是，郑洛兵还，永邵卜、火落赤、真相诸部复聚西海地区，时时攻掠西宁卫一带。明廷用“分陕久，熟西事”^⑤的永凉兵备道田乐任甘肃巡抚，以对付西海和松山、甘山诸地蒙古，然而久无战功。

到了万历二十三年（1595）四月，礼部祠司郎中龙膺被贬为西宁卫监收通判，同月，李汶总督陕西三边，六月，刘敏宽任西宁兵备副使。此时，凉州回族名将达云也升任分守西宁参将。在此文武官史协同背景下，以田乐为主要领导的明朝军队才取得了“湟中三捷”的空前奇功。

二

万历二十三年五月四日，“甘山大捷”以“追奔二百余里”，^⑦“斩首六百七十余级”，^⑧“青酋单骑走”^⑨的战绩开创了“湟中三捷”之首捷，先须说明两个问题。

第一，关于这次大战，《明史》、《甘镇志》、《甘肃新通志》、《甘宁青史略》、《西宁府新志》等皆漏载，《万历武功录》、《明史纪事本末》、《明通鉴》等也未提及，但根据《西镇志》、《纶瀚全集》中所载有关碑记和《国榷》、《明实录》中记载，可以肯定这次战事确是“湟中三捷”之一捷。刘敏宽在作《湟中三捷记》的同时又作《封祁连山铭并序》说：“夫甘山之捷以合围，其勇胜也；南川之捷以掩击，其略雄也；西川之捷始以坚壁，继以长驱，勇略备矣。……六月三捷，通计首功二千四百有奇。”^⑩从五月至十月西川之战刚好六月。可见，当时人把“甘山之捷”包括在“湟中三捷”之中。

第二，甘山之战发生在河西走廊，如何能算在“湟中三捷”内呢？据笔者读书所得，明代人中的地理概念“湟中”的外延有时很大，如嘉靖时包节被谪戍庄浪期间所作诗文，后来结集时，径题为《湟中集》；龙膺所著《湟中集》中一大半诗都是在河西走廊所作。当然，这并不是说当时湟中就包括了河西走廊，但这一现象至少能说明这样一个问题，即对一片大的区域还没有一个恰如其分的地理名称时，可以选用比较著名的一个地名来代指。明代名将郭登被贬甘州所作诗中常自称“羁客青

海”，致使今天一些人常常因此而误以为郭登被贬到青海湖地区。我想包节、龙鹰的著作名称如同郭登以“青海”代甘州一样，是以湟中代指了河西走廊东段。因此，刘敏宽、龙德孚、龙鹰等人把甘山之战放到“湟中三捷”中也是可以理解的。

“甘山”即龙首山，“在丹山县西北三十里，俗名北山，即张掖县之甘浚山。”^⑩其西北有昌宁湖，为丰美牧场。万历年间，东蒙古切吉台吉的从子“青把都儿先居昌宁湖”以游牧，后来便“渐次移驻于”^⑪甘浚山。他们与青海的永邵卜等遥相呼应，此退彼进，彼退此进，“素称狡黠，流蜚甘凉”，^⑫使明朝军队两头疲奔，劳而无功。

这年四月下旬，甘肃巡抚田乐会集诸将商议消除甘山、青海边患之策，他认为：“青酋近窥甘泉，永酋逼穴湟中，我西则青酋东举，我东则永酋西发，首尾牵制我兵，内顾不遑。酋盖以此为长计，以绊我兵，使我疲于奔命耳。青酋恃强无备，今出不意，势可必克。青酋即克，则得专力于青海，而永酋可擒也。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”^⑬于是撤甘州镇所辖各地之兵，分为四路，潜师奇袭甘浚山。

关于战斗部署情况，龙鹰《甘山大捷题名碑记》中记载说：“某以一军壁某地，扼其吭；某以一军壁某地，随其肩；某以一军壁某地，断其臂；某以一军卷甲疾驱，捣其胸腹。”^⑭龙鹰称“某”而不称姓名、地名，可能是因为当时他在西宁，未参加具体战斗，了解不详之故。

五月初四日晨，青把都四面受击，帐幕大乱，“自相剥灭，迸奔冒窜”。^⑮田乐自率后军策应，登上甘浚山，亲自指挥厮杀，并率兵追击二百余里，青把都匹马脱逃。甘山一带又归明政府掌握，出现了“原燎云散，罔有孑遗，千里无烽，甘山宁晏”^⑯的和平局面。

田乐以为永邵卜等闻讯后要赶来救援，“于是尽甘、永、凉、庄骑率为三伏，以待永酋。”^⑰但是永邵卜等并没有往援。

田乐上任巡抚以后取得第一个大胜仗，捷报传到北京，朝议认为是西陲一大功。七月十三日，神宗“常朝之期，御前宣捷，遣官祭告”郊庙，“宣示中外，以彰殊勋”。^⑱

甘山一战，消除了明军对付西海蒙古诸部的后顾之忧，同时也振奋西宁将士的士气。

三

甘山之战结束，因为设三伏以待永邵卜之计落空，田乐便传嫩西宁兵备副使刘敏宽、参将达云等注意防范。

永邵卜是俺答从子，曾被明朝封为都督同知，进龙虎将军，后进入西海，部众强盛，与瓦刺他卜囊等成为西宁明军最头痛的敌人。因为万历十六年进攻南川，杀死明将李魁，很骄傲，“益有轻中国心。”^⑲当他得悉青把都大败，便认为田乐“适胜于东，必不暇虞我。我得胜，大可要顺义之爵，次不失报青部之仇，且西宁之番可以尽收，五郡可图也。”^⑳可见永邵卜的野心很大，企图将西宁周围藏族部落全都收为役属，进而占据河西五郡，并以此要挟明朝封他以“顺义王”的爵位，总长蒙古诸部。他们还商议：“九月九日，汉儿重阳，必不知设备。”^㉑遂决定以“后先虚实”之计，在重阳日从南川进攻西宁。

当时，刘敏宽、达云、龙鹰等自上半年便从各方面进行了军事准备工作，并继续用郑洛之策，对藏族进行慰抚团结。八月，永邵卜谋已被藏族西纳族锁南列思巴、刺卜尔族完卜等获悉并报告明军。龙鹰提出将计就计、诱敌入峡，再正面短兵相接，敌后左右伏兵合围的策略，刘敏宽等采纳了这一建议。

九月七日，探知永邵卜50余骑已前来南川捏尔朵峡。八日，刘敏宽以主将身份进行了布署。由碾伯守备郑恕、中军李可爱率兵1000屯于乞答其地方，古鄯守备邓荣祖率兵600屯于阿尕堡，西宁土司把总祁秉忠率兵500，中军百户夏孟明率兵250，分别埋伏于捏尔朵峡左右。又派西纳、刺卜尔、申中等诸藏族部落首领率藏兵结集于峡外，绕出敌军之后，等敌军败逃时截杀。而由镇海游击白泽将兵两千为中应，达云率精锐两千屯于南川隘门，北川守备余世威、镇海中军杨桂率兵九百与达云策应。同时，派人通知永邵卜：允许其于次日进入南川款市，但精甲不得阑入。

九日晨太阳刚出山，永邵卜部的一千余骑进入南川，大叫“与我款乎？”意在挑衅性试探，而将另一千精锐骑兵伏于后，准备在前军交战时突然出击。永邵卜先头部队刚进入峡中一大半，四面伏兵

齐起白，泽与藏兵截其后，刺卜尔藏兵从左翼进攻，申中、隆卜等藏兵从右边进攻，而达云率骑兵从正面短兵相接。杀声震天，鏖战激烈。蒙古骑兵见被围，已是阵脚混乱，前后冲突，未能突围而去。达云身先士卒，于阵前斩了前年在南川杀死李魁的蒙古军头领把都尔恰。失去了指挥官，敌军斗志大损，只顾各自奔逃。

到中午时战斗结束，“获夷级六百三十有九”。^②而埋伏于后面的蒙古兵，听到杀声后赶来，却被藏兵包围住，杀伤了许多，大部分逃走。藏兵乘胜追击，一路俘获牛羊幕帐很多。

战斗结束，刘敏宽即传令白泽，率兵赶回镇海营，“移兵守隘”，^③以防永邵卜等乘西川空虚进袭，并指示刺撒尔等藏族部落协助防范。果然在第二天，蒙古兵500余从拉沙尔西山林潜入，被击退。十二日，蒙古70余骑又从西石峡而入，也被击退。这两次小小的战斗只不过南川大战的“余音”而已。南川大战及西川小战，前后共斩首680有奇，俘俘无算。

在“湟中三捷”中，就数南川之战最有影响，各种有关史书都主要记载了这次战斗，可惜大多失去了真实面貌，如都未记龙膺筹策诱敌深入之事。这次战斗是由谪官龙膺筹策、刘敏宽总指挥，达云率官兵和西宁土司兵、藏族部队联合作战的，对永邵卜给予了沉重打击，“且士马无伤，刍餽不糜，无论为九边近日所罕闻，即自成祖三犁夷庭以来，所仅见者。”^④

捷报上传，从朝廷到督抚都很兴奋。总督李汶、陕西巡按御史乔廷栋等九月二十一日亲到西宁，勘阅南川战场。乔廷栋高兴地称道：“是役也，可以雪百年之耻，可以消九原之恨，可以振中国之威，可以落毡裘之胆。两河士民，无不鼓颊加额也。”^⑤捷至北京，兵部尚书石星称道：“真是树壮猷于九塞，岂直筑京观于两河。”^⑥神宗也“大悦”，遣使祭告郊庙，并拨银一千两，派使者到西宁宴劳将士。

《明史》、《明通鉴》称南川之战为“西陲战功第一”，高度评价了这次战斗。对于其性质，瞿九思在《万历武功录》中说：“西宁之捷，奇兵也，亦义兵也。”^⑦这是有道理的，永邵卜欲图乘款市举兵，一鼓攻占西宁，而龙膺将计就计，虽仍许款市，但仍不失为正义之举。战斗中斩了杀害李

魁的凶手，为明军死亡将士报了仇，同时这一战也吐了藏族和西宁各族人民长期遭受剥削抢掠之气。

四

南川告捷，田乐对事态的发展作了分析。他认为：“夷多方误我，而为我所算。今永酋虽大创，而火酋独完，真相纳刺等全部犹盛。齿唇之患，计所不免，众愤既同，众力必齐，此非诸将之所能办也。”^⑧于是率精健三千驰赴西宁，亲自督师防御。

不久，西纳藏族密告：蒙古诸部将于十月十三日出犯西宁。果然，永邵卜不甘心其失败，他纠集火落赤、真相等诸部倾巢而出，瓦刺他卜囊等在前，真相、火落赤在后，连络数十里，精甲数千，共约15000余骑，号称两万，于十月十三日从湟源一带进犯西川。他们满腔忿然，意图进行血腥报复。

当时诸将多认为应分兵扼守各卡隘，勿使蒙古军进入西宁卫地。田乐听取龙膺诸人意见，说：敌军来势迅猛，若分兵驻防，可能反而抵挡不住，还不如先放其进来，对垒时日，以消其锐气，然后再进行围歼。又传话给刺卜尔藏族，敌军来犯，“若力能守者，坚守十日，我必破贼；力不能，相机从违，勉图后续。”^⑨数日后，刺卜尔便假降了蒙古军。蒙古军又进而包围了康缠沟堡，相持数日不下。

二十二日，田乐下令勒大营于康缠东边杓儿湾的西宁主将达云节度前线诸将，由中军荣国柱率千总王汝翼、刘衍祚、把总彭大系、刘一正、李荣先、王天泽、达世贤等西宁营官兵900札营于其南，守备余世威及甘州标下中军张君恩、千总高科、把总刘承惠、周自新、滑熙皋、秦大川、李承系等率领赞理营兵800暨北川兵五百札营列其东，游击张应学、庄浪千总李希靖、把总孙尚、文光、李秉诚等率庄浪兵800札营列其北，守备邓荣祖、庄浪中军何隆、千总鲁之由、安承化、把总乃天禄、毛林等率领协营兵六百暨古鄯兵300札营列其西。形成了一个包围圈。

蒙古兵挥众四面齐攻，达云指挥将士分头迎击，炮声动荡山谷，矢箭飞如急雨。蒙古头领不顾伤亡惨重，旋退旋进，猛攻以泄忿。从上午一直到下午，激战百余合，没有攻破明军阵营。于是永邵

卜集中骁悍精锐，长枪钩杆，向南只攻柴国柱所部西宁兵营。柴国柱是青海名将，勇冠三军，凤号梟雄。蒙古兵仍未取得成功，咋舌叹道：“何物汉儿如一片铁耶？”^③

这时，田乐怕敌众我寡，悬殊太大，诸将不敢用力拚战，将西宁四川防御工作和巡警西金城垣的任务交给刘敏宽和通判高第，率龙鹰以及余德荣、郑恕、鲁光国、李可爱等官兵1200名亲自前来，慨然而誓道：“不亲灭此虏，何暇寝食？”^④当时还有西宁卫都指挥袁桂中、百户许尚仁、始祖等装载火箭枪炮等军需品共80余辆车随后而行。傍晚时，田乐等到达徐家寨，永邵卜等战斗了一天，精疲力尽，又知明朝后援部队到来，便收兵屯札。

田乐等夜宿徐家寨荒祠，连夜筹划军事行动，认为永邵卜等久战不利，又见我援军到，可能要遁逃，便一面派藏民乘夜去蒙古军营，伪称被俘后逃了回来，然后约刺卜尔等作内应；一面传檄柴国柱率健兵绕左边干沟，镇海游击白泽率兵绕右边小康缠沟，各从小道潜至敌人后方，待其退时截杀。

次日，田乐自率大军正面直驱蒙古军营。果然永邵卜等自料不胜，便以精甲殿后，其余的赶着所掠牛羊畜牲往西石峡撤退。这时刺卜尔藏民乘乱倒戈反击，明军乘势掩杀，蒙古军大溃。但因白泽所部未能及时到达目的地截杀，永邵卜等逃出了西石峡。田乐发前锋追击，龙鹰这位名噪一时的诗人居然跃马挥剑，率兵一直追到白石崖而返。西宁卫彻底肃清，永邵卜、瓦刺他卜囊等部连夜徙帐于盐池以西，火落赤渡黄河向南而去。“湟中三捷”的最后一捷宣告结束。

这一战，明军以五六千人对付蒙古15000余人，以少胜多，斩首800余级，其中包括满克王、把汉他卜囊、脱赖舍人等十名部落头领，俘获牲畜器械多不胜数。可称得上是一次奇捷。

捷音报到北京，神宗大喜，遣官祭告郊庙，并令兵部叙功行赏。十一月，兵部主事陈楚产奉命携带银币，专程到西宁宴劳文武将士。

西川之战所以能以寡胜众，迅速决胜，明朝官员们自吹是由于田乐号令严肃，指挥有方。当然也不可否认有这方面的因素，但客观地看，仅是一个很小的原因。主要原因是，青海东部明军和各民族人民长期以来深受蒙古贵族之患，真所谓“屡遭蹂

躏，不可胜计，甚而戕我将领，歼我士卒，收我属番，撤我藩篱，虐刘我人民，僇辱我士女，罪恶种种，擢发难数”。^⑤所以这里的官兵和土著汉族、土族、藏族等人民能同仇敌忾，齐心协力，共同作战。如西宁嘉靖进士张问仁本闲居家中，而此刻却活跃于戎幕，出谋划策，乐而不疲；祁秉忠等土司率领家兵参战，或征杀，或运输，卓有成绩；藏族部落除刺卜尔、西纳诸部外，尚有大咎哑、申中等各部共同出300精骑，原与明军联合作战，又有果迷等十九族7000余名也听明军调遣行动。藏族部队在前后战斗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，后来兵部领功时也不得不承认：“此一役也，官兵之截战，诚为首功，番众之夹击，亦为殊绩。”^⑥如果不是蒙古诸部肆意抢掠的非正义性和广大各族群众的支持，将士的奋战，明军企图战败多于自己近三倍的蒙古骑兵，那是很难设想的。

五

湟中战事结束后，为了保证地方安宁，刘敏宽等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，主要有：

一、重将权。当时西宁卫属甘肃镇管辖，而西宁离镇城甘州有一千三百余里之遥，西宁一旦有事，因无职权较高的良将，往往很难对付。因此刘敏宽建议朝廷留良将镇守西宁，并给予更多的兵权。参将达云因为在南川、西川两战中建有大功，为军民所倚重，提升为副将，镇西宁，“节制庄浪、西宁各营兵马”^⑦升柴国柱为都指挥僉事，久留西宁营，为达云辅佐。同时，对西宁一带武官作了调整增加，参将以下有中军一名，千总三名，哨把总六名，管火器把总两名；各游击以下有中军一名，千总、把总各二名；各守备以下有中军、把总各一名。在南川、石灰沟、沙棠川、哈喇只沟、平戎驿、胜番沟、冰沟、老鸦城、上川口、下川口、上三川、下三川、乱迭沟等要地皆派兵驻扎。由于有了达云、柴国柱等这样一批名将以及各级将领严密防守，西宁副将的权力也有所扩大，因而后来永邵卜等虽偶尔入掠西宁，但都被很快反击了回去，“海寇之患”逐渐削弱，保证了西宁地区的安全。

二、增募兵。刘敏宽提出西宁地区既广，需要驻防的地方多，要增募步兵1000名，并要求户部每月拨银20000两作为军饷。于是在西宁等地招募士兵，至万历二十四年（1596）时，西

宁共有马步兵9710名。其分布是这样的：西宁营参将统领3152名，碾伯营游击统领1442名，镇海营游击统领1656名，北川营守备统领908名，古鄯营守备统领1040名，南川堡防守统领206名，石灰沟防守统领152名，仙迭沟防守统领200名，沙棠川防守统领360名，哈喇只沟防守统领80名，平戎堡守备统领140名，胜番沟防守统领66名，老鸦堡防守统领220名，冰沟防守统领104名。各以地方缓急大小，拨兵防范，年终更换。另外还有李土司士兵410名，祁土司士兵500名，如有动乱，即听候调遣。这些士兵闲时屯田，自给军粮，对于安定西陲边疆，促进农业生产起了重大作用。

三、收番族。这其实是继承了郑洛诸人之策。包括两个方面：一是对抵御蒙古贵族有功的部落进行重赏。刘敏宽曾称：“湟中番族，性不畏虏，惟当鼓舞而用之，平时为之筑堡赈恤，有功区别重赏，使番以我为依，而乐为我用。”^{③⑥}因此，报请朝廷对西纳、刺卜尔、申中、隆奔、罕冬、大咎喱以及瞿县寺的头领大行奖赏，对班撒儿、思蛮、下咎喱以及圆觉寺、宝贝寺、会宁寺的大小头目，也量行奖赏，对隆奔等藏族头领还册封了国师等头衔；二是招抚被蒙古贵族役属或因不堪忍受剥削而远从的藏族部落，在边外数百里凡水头道路处遍插百十杆白旗，上面用藏文写上招抚的意思，号召他们乘便从西宁和甘州两路归来。这一政策的效果是很明显的，如到二十四年八月，仅镇海堡收抚藏民15起，共7540名，甘州地区不数月就招归4000余人。对于归来者，给散布匹米面，安插到原地方驻牧，部落“大者创寺建刹，封以国师、禅师名号，小者授官给帖，加以宛卜、头目等名。”^{③⑦}这种作法既孤立了蒙古贵族，又安定了边疆各民族人民的生产和生活，具有积极意义。西海蒙古终难大举，最后不得不逐步徙离。

六

湟中三捷之后，明王朝的赏功活动是值得注意的。

南川之战重阳日结束，至十月初一奏到朝廷。这天早上，神宗刚好颁发了《圣寿万年历》，东阁大学士赵志皋等人朝贺回署，首先得知这一捷报，便乘机给神宗阿谀上奏：“今日朔旦，恭遇颁历，

方同百官拜领恩赐，到阁办事，接得三边督抚李汶、田乐塘报，海虏酋永邵卜等于九月九日内犯，参将达云、游击白泽等设伏邀击，斩获虏首六百七十余级，皆我皇上神武布昭，天威震赫之所致。顷者套虏入犯延缓，方有擒巢之功，今海酋内侵甘肃，复奏殊常之捷。且捷音之至，适当颁历之辰，又天心默助，圣历无疆之兆。”^{③⑧}也许颂德有功，叙功时居然赵志皋、张位、陈干陞、沈一贯等一批大臣也“各陛觐银币”。^{③⑨}兵部尚书石星“调度有功，著加少保，”^{④①}西川之战后又进太保。或起官或发财，不一而足。

其实，赵志皋、张位诸人只不过接到捷报后向神宗传报了一下，有何功劳可言？石星等与战事无关，何来的“调度有功”？说穿了，只不过是“朕心嘉悦”后的梦吃滥赏罢了。

更为可笑的是，南川之战以前，龙鹰曾向李汶、田乐建议诱敌深入围歼的策略，李汶是基本反对的，龙鹰立下了“倘或不利不佞，以身当之”的“军令状”后，才与刘敏宽等布置了南川一战，从而取得大胜。当时李汶尚在陕西，田乐也远在河西走廊。二十余年后，龙鹰上书言事，还说当时他与李汶等人的来往信札“现存”。^{④②}南川告捷，李汶才赶来勘阅战场，之后西川之战也未参加。可是石星《议南川陞赏疏》中想当然地吹饰说：“李汶纬武经文，运机宜于掌上，飭兵简将，决胜算于胸中。扫运马之群，威名赫乎四镇；奋吞胡之志，勋业烂于千秋。功属无前，恩宜加厚。”^{④③}简直是一派胡言。昏馈的神宗同样不察实际，晋升李汶为“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，照旧总督，荫一子锦衣卫副千户世袭。”^{④④}

而南川之战的筹策者龙鹰，直到西川之战后，才被“破格”叙用为同知，仅升一级，事实上，龙鹰在两战中既有筹策之功，又有临阵杀敌之劳，岂是李汶、石星等大官们所能比拟。其它出生入死，陷阵斩将的中下级将士也绝大多数没有得到应有的升赏，如达云、柴国柱等只不过升得一、二级罢了。尤其是对两次战斗中配合明军夹击敌军，立下殊绩的藏族部落，除少数外，其余的也奖赏有限，有的史学家根据当时邸报等，甚至抹煞藏族部落侦探报信之功，说什么“我塞上度瓦酋必以是日（指重阳日）至，先期我兵备使……”^{④⑤}云云。将这些与赵志皋、李汶诸人的升官荫子相比，是多么的不

章嘉·若必多吉与清朝皇室兴建的喇嘛寺院

陈庆英

有清一代，扶植藏传佛教中的格鲁派以巩固清朝在蒙藏地区的统治即所谓“兴黄教，即所以安众蒙古，所系非小，故不可不保护之”，①是基本的国策之一。随着清朝皇室与藏传佛教的关系逐步加深，在北京、多伦诺尔、热河、五台山等地出现了一批皇室兴建的喇嘛寺院，成为藏传佛教的又一个活动中心。在兴建这些寺院的过程中，一些活动于宫廷的佛教僧人发挥过重要的作用，被清朝封为灌顶普善广慈大国师的章嘉·若必多吉即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个。

章嘉·若必多吉亦名意希丹贝准美，藏历第十二饶迥火鸡年即公元1717年正月初十日诞生于甘肃凉州西莲花寺附近，1719年被认定为二世章嘉活佛阿旺洛桑却丹的转世灵童，1720年被迎入青海省互助县佑宁寺坐床，成为三世章嘉活佛。不久，青海发生

公平！

如此赏罚不公，除严重损伤了广大将士的战斗积极性。龙膺非常气愤，多次上书，陈述加强边防力量的措施，其中有“破格以激励”一条中说：“今有罪则责偏裨将帅，功则往往归于督抚大臣，而缮库持筹，乘危履险，出九死一生以冒矢石者，仅仅一加秩，一赐帛，甚则弃而不录终其身，又甚则死以殉国，而身与名竟俱泯。”④因此他强调要革除积弊，严明赏罚，升用人材，以挽回辽东局势。可惜没有得到当局者的重视，明王朝终于免不了走上倾覆的道路。

注释：

①②⑤《明史》卷330《西宁诸卫》。

③郑洛《收复番族疏》，见《西宁府新志》卷38。

⑥⑧⑩刘敏宽《封祁连山铭并序》，见《西镇志·碑记》。

⑦⑮⑯《明神宗实录》卷287。

⑨⑫《甘州府志》卷16。

⑪③⑤《甘宁青史略》正编卷16。

⑭⑱⑲⑳㉑㉒㉓张问仁《湟中破虏碑记》，见《西宁府新志》卷38。

⑮⑯龙膺《甘山大捷题名碑记》，见《纶瀚全集》卷6。

⑰龙膺《田公司马河西尸祝碑记》，见《纶瀚全集》卷6。

⑱《明史》卷239《达云传》。

⑳㉑㉒刘敏宽《湟中三捷记》，见《西宁府新志》卷38。

㉓石星《议燕劳疏》，见《西宁府新志》卷38。

㉔乔廷栋《勘南川功疏》，见《西镇志·奏议》。

㉕㉖石星《议南川升赏疏》，见《西宁府新志》卷38。

㉗㉘《万历武功录》卷9。

㉙龙膺《湟中三捷图序》，见《纶瀚全集》卷2。

㉚李汶，田乐《叙南川战功疏》，见《西宁府新志》卷38。

㉛㉜㉝㉞《明神宗实录》卷294。

㉟㊱李汶，田乐《题为海夷被创远遁，设法招收番族，以孤敌势，以保藩篱事》，见《西宁府新志》卷38。

㊲《国榷》卷77。

㊳㊴龙膺《言事》，见《纶瀚全集》卷2。

（本文编辑 一之）